

## 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 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王永祥 温锐 冯崇义

自1984年8月南开大学主办第一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中国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国内外有大量的论著资料发表出版。7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著作、回忆录、资料集等书籍已达140部以上，发表的文章近600篇，研究的课题也丰富广泛。1991年8月1日至4日，南开大学举行了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包括中国学者50余人和来自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等国的学者34人。会议收到论文近70篇。会议讨论了有关抗日根据地的各种问题。

### 一、关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研究

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问题，实际就是敌后广泛的游击战争问题。魏宏运作主题报告《游击战争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巨大历史作用：（1）组织动员了全民族抗战。它在山地、平原、水乡的广大敌后地区打击日军，迫敌龟缩于大城市与铁路沿线，使日军占领区成为孤岛与死城，无法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2）锻炼了人民的抗日力量，提高了人民军队的素质。（3）游击区是将敌占区变为抗日根据地，逐步收复失地，改变敌我态势的必由之路。经八年抗战，游击战从山区向平原，向整个华北以至大江南北发展，共创造了15块大的战略基地，使抗日战争形成一个犬牙交错的壮丽景观，大大缩短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4）中国全面抵抗日军八年之久，拖住日军总兵力一百余万，游击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姜平指出，游击战把全民总动员最彻底地实行起来，从抗战中期开始一直抗击着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从而把敌人从战略上包围起来，并创造出遍及敌后的战略反攻出发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也起着战略配合作用，其效果不是战役行动所能达到的，是不间断地实行战略进攻的结果。

高德福论述了“敌进我进”军事方针，认为“敌进我进”是在太平洋战争

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蚕食”和“清乡”活动的背景下，根据敌变我亦变的原则提出来的新的军事指导方针，它改变了“敌进我退”的不利态势，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不仅在战术上，而且在战略上发生了极大的效果。有的学者则认为，“敌进我进”不是战略方针，而是战术方针。

美国范力沛探讨了百团大战问题，认为：百团大战并非是一场计划周密，进行了充分准备的战役，其原计划是对正太线作一系列联点进攻，而把沿平汉线和同蒲线的其他行动列为第二步行动计划。然而，首战告捷使领导者产生了更多不切实际的期望。战役使双方都遭到惨重损失。对中共来讲，战役虽取得了相当成功，但不仅损失惨重，而且导致了日军的疯狂报复。

对敌后解放区战场有无战略反攻阶段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会上发生了热烈的争论。王桧林认为，没有战略反攻阶段。他认为，在日军投降之前，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进攻阶段还未到来。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极复杂极特殊的条件下取得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战略反攻主要是在日军宣布投降之后进行的，表面上是八路军受降与日军拒降之战，实际上是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讨论中有人认为有战略反攻阶段，其根据是：（1）敌后战场的军事斗争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对它的攻防问题不能孤立考察；（2）各根据地1944年的局部反攻应称作战略反攻的开始；（3）中共军队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到阵地战的转变亦说明了一个战略反攻阶段。

英国班国瑞论述了新四军建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与矛盾，探讨分析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日本三好章则认为：新四军与八路军相比，其来源不同，且更重视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很大差别。一些国内代表认为，新四军与八路军同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差别不能夸大。

## 二、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和政权研究

田酉如论述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靳德行探讨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的体制问题。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体制到1942年9月以后才定型化，其间经历了以陕甘宁边区政府

和晋察冀边区政府为示范的创建时期、以简政和“三三制”为中心内容的体制发展与改革时期，到1942年9月才确立并逐渐完善和定型于政权的一元化体制。不少学者从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关系、“三三制”体制或某一根据地内的政治体制等不同角度探讨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王永祥提出：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促使中共在政权建设中强调不搞一党专制，而实行抗日民主党派合作。刘健清认为：“三三制”为建国后提供了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经验。王德宝进而探讨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中的参议会，立法、行政、司法、监察、选举、军事、财政等制度的实施情况，并将华中根据地的参议会与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体制比较，论证了它的特点与优点。陈瑞云从政权代表的广泛性、政权体制实施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风纪三个方面，将抗日民主政权与国统区的国民党政权加以比较，认为抗日民主政权是民主、廉政的楷模。江沛探讨了中共在政权建设中重视廉政、克服腐化现象的成功经验。

冯崇义则从文化心理角度探讨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爱国主义思潮与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朱德新对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面政权”进行了研究，认为：“就一般情况而言，‘两面政权’是由敌伪政权向完全革命政权过渡的必经中间环节”。

### 三、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研究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研究方面，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星光探讨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制度的发展与形成。他认为，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历了主要忙于筹款筹粮、征收田赋、收税收公粮和发行公债的创立时期和根据地财政陷入非常拮据的困难时期之后，中共中央才总结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工作和财政的总方针”。徐承伦、傅建成、黄存林、金普森、日本内田知行等还分别对个别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手工业经济、对外贸易、交通建设、合作经济等问题，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填补了以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

美国马克·塞尔登研究了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把抗日根据地内推行的经济改革称为“静悄悄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其内容则包括赋税改革、减租减息以及在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建立互助等初级的合作制。温锐认为：以减租减息政策和税收调节政策相结合，导致了抗日根据

地内一场悄悄的土地变革运动，揭示了另一种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可行方式：立足于依靠法律政策，利用经济杠杆，具有平和、渐进和稳步发展的特点，为此后的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村经济管理留下了有益的经验 和 启示。日本林达·格洛夫认为：减租减息运动拉开了许多地区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一些学者则认为，和平、渐进与改良的土改方式，只有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特殊的环境才能适应，其它时期则根本行不通。日本佐藤分析了陕北地区农村村落及阶级结构：经过土地革命以后，延安地区农村阶级结构由老住户与新迁来户构成，其中老户等于中农、新富农，新户等于贫农、雇农。在抗战时期，中共在该地农村主要依靠老户，即中农与新富农。他们是中共农村基层的政治中坚和巩固边区财政基础的核心力量。当年的“吴满有方向”就是中共农村社会政策的体现，它也是整个“延安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大卫·古德曼则对太行与陕甘宁两个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地处抗日前线的太行根据地与地处大后方的陕甘宁根据地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都各具特色。

#### 四、关于抗日根据地内中共与农民关系研究

将抗日根据地与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联系起来考察，探讨中共与农民的关系，这是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一个新进展。

法国毕仰高认为：农民自身从来就不是一个现成的革命阶级。在抗战初期，根据地内首先响应中共号召的是乡村精英和游民、流氓这两极，而非农民主体，由于中共在经济方面推行了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因而逐渐将农民吸引到抗战救亡运动中；但是，即使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农民，更多的则还是顺从共产党。美国拉尔夫·撒克斯顿则强调现代革命运动中农民的自觉性。他通过对冀鲁豫边地区农村的考察，认为中共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的动员与号召，也不是利用了“贫民民族主义”，而是共产党顺应了当地民众的要求，因为，在那里的原有国民党统治威胁到当地民众的生存，而抗战爆发以后，在这里发动抗战的中共是保障他们生存条件的唯一政党。美国周锡瑞不同意西方学者关于中共获得中国农民支持的诸多解释。他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陕北农村社会，试图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乡土文化传统中寻求问题的答案。他的结论是：中国(陕北)农民参加中共或中共军队，不是根源于阶级意识、爱国主义或政治参与意识，农民的真正动机是

通过参加中共获得权力，从而改变自身的贫穷生活。”

美国马克·塞勒登认为，中共获得中国农民的支持，并非取决于单一因素，应是诸方面因素并存，更重要的则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所推行的社会改造纲领，首先进行了经济改革。他还认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中曾建立了比当时中国其他地区，也比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令人鼓舞的初步民主政治，支持中共的民众不只是贫苦农民，一大部分农村精英，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也都投身于中共的事业中，只要中共的社会改革政策能继续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它就能同时获得贫苦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的拥护。他进而指出：中外学者迄今对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愿望要求以及他们对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应都不甚了了。他呼吁中外学者继续研究中共与农民的关系，特别是加强对中国农民及农村社会的研究。另外，日本马场毅则探讨了中共在山东农村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使农民广泛地参加抗日运动，从而创造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一些学者把抗日根据地与农村秘密结社以及会党结合起来研究。日本三谷孝认为，华北地区红枪会是地方陷于无政府状况时为保障农村社会共同利益而结成的村落自卫组织，似乎是政治上的“中立”力量，因而成为中、日两军都争取的对象。张洪祥认为：在冀中地区，受地主阶级控制的联庄会和其他会门组织，成份极其复杂，他们遍布各县，扎根农村，拥有众多的农民群众和武装，左右着乡村政权。中共制定了争取抗日为主，打击孤立汉奸、反动分子的正确方针，首先消灭了冀中土匪武装，安定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然后，成功地收编与改造了众多的联庄会和会门武装参加抗日，从根本上消灭了冀中农村的封建堡垒，形成了统一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为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乔培华认为，豫北地区的天门会是一支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封建成份的近代农民结社团体，抗战时期已发展成为该地区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成为国共两党及日军三方面都争取的对象。共产党以“卫西工委”做争取天门会的工作，基本控制了天门会，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对上述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天门会虽与中共有合作，但不能说为中共完全控制；有的学者则不同意冀中联庄会“由封建地主阶级控制”的观点。

## 五、关于毛泽东思想与抗日根据地关系的研究

郑德荣认为，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王淇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思想。胡哲峰通过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比较，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创造根据地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

左志远论述了中共在华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战略思想的由来与形成。张国祥论述了在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业绩。杨世钊论述了周恩来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 六、其他

英国狄德满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教会、传教士的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台湾艾丽丝·A·戴维多深入探讨了1936年到1942年共产党山东地方组织的重建过程与它对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荷兰利奥纳多斯·道伍则对中国30年代成立的地政学会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两个农村经济研究机构进行了比较研究。陈志远探讨了抗战胜利前夕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之行对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影响。马洪武、傅希忠则分别论述了华中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中心涉县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李恩民探讨了科学技术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根据地内的社会进步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黄小同研究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天津地下党的关系。祁建民、日本内山雅生对战时日本“满铁”开展华北农村社会调查的目的、内容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日本笠原十九司论述了战时日军在华暴行等等。

讨论会结束后，8月5日至8日，南开大学还组织部分中外学者前往太行山区原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旧址参观考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